

Under the Sky: an All-inclusive China

# 天下



包纳四夷的中国

韩毓海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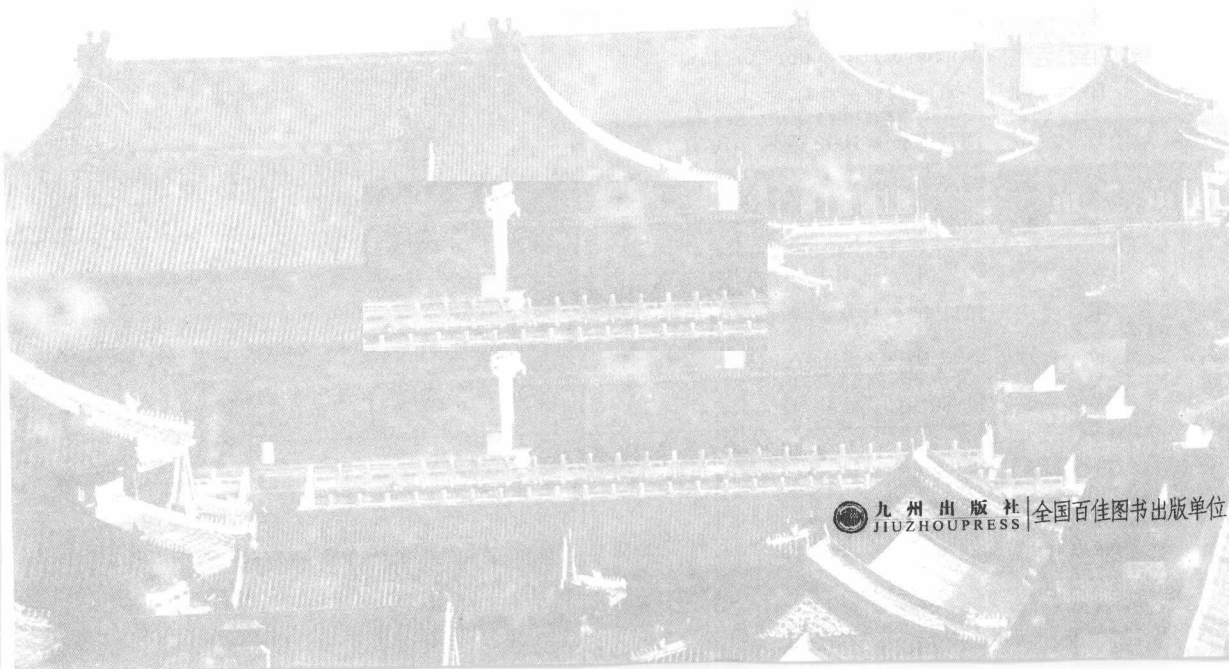


Under the Sky: an All-inclusive China

# 天下

包纳四夷的中国

韩毓海 著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下 / 韩毓海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1.2  
ISBN 978-7-5108-0818-0

I. ①天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国—历史—研究  
IV. ①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61149号

天下

---

作 者 韩毓海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[www.jiuzhoupress.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

电子信箱 [jiuzhou@jiuzhoupress.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

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22.5

字 数 33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818-0

定 价 39.80 元

---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## 修订版自序

1945年7月，访问延安的黄炎培，曾经向毛泽东提出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问题。

他说：“我生六十多年，耳闻的不说，所亲眼见到的，真所谓‘其兴也浡焉’，‘其亡也忽焉’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。”

“一部历史，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，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，‘求荣取辱’的也有。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。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，我略略了解了，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，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。”<sup>①</sup>

据黄炎培的回忆，毛泽东对黄所征询的“新路”的回答，似乎异常地简略：这便是“民主”。

而上述著名的问答，当然是根据黄炎培个人的回忆，却并未见诸于毛泽东的文稿。

今天，鉴于“民主”非常的普适、永远地正确，而又绝对的抽象，时贤纷纷然以“黄金周期率”相标榜，此固不能说是借黄老之酒杯，浇自己“胸中之块垒”，但也恰恰表明：正是根据黄炎培老人这著名的回忆，从此之后，所谓“民主”，便成为跳出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万金油，成为“普天下最好的东西”，似乎只要一朝“民主”，从此后便天下太平，万事大吉了。

其实，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对上述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问题，做了极其著名的解释和回答，这就见诸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讲话：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，

<sup>①</sup> 黄炎培，《八十年来》，文史资料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48页。

这就是因为它对现状和自己有所不满，而所谓“不满”者，也就是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，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日常化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方才会埋头苦干、奋斗不息；同理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之所以会停滞不前、“政怠宦成”、乃至“人亡政息”，那就是由于它骄傲自满，如此，就必然会丧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伟大的武器，从而也就会失掉了艰苦奋斗、埋头苦干的意志：

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。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，保持优良作风。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。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<sup>①</sup>

“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，这句毛主席语录，我以为比一切民主教条都更为具体，比一切“普适价值”都更为切中文明的积弊，它直指人心的深处，简明扼要地回应了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这个问题。

“不满”是一国、一族、一人、一家前进的动力，而“自大”则是其堕落的开始，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但他以为更加不幸的却是：由于中国开化最早，号称文明天下第一，自满、自负、自足便是我们文明的常态，而所谓的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，在某些中国聪明人的眼睛里，经常反倒是无事生非、乃至犯上作乱了。

宫崎市定教授曾经说过：“人类所抱的‘不满之感’，显著地表现于三个方面：一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所产生的、对己对人的不满之感；其次是贫困者接触富裕者时所抱的不满之感；第三是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的现状而感到的不满之感”。<sup>②</sup>

他的言下之意是说：夷狄、年轻人和穷人（无产阶级），乃是人间“不

<sup>①</sup> 毛泽东，《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438—1439页。

<sup>②</sup> 宫崎市定，《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》，刘永新、韩润棠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62年，第3页。

满”的三大源泉，因此，他们也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。

而这似乎又不甚适合于中国历史的情况：我们自古便是一长幼有序的社会，德行以“忠孝”为先，而儒家学说的厉害，便在它自源头上就剥夺了年轻人“不满”的资格。加之我们长期又是一发展较均衡之社会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贫富的差距相对较小，以至于1800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已是无产阶级的时候，中国无产阶级还占不到人口的10%。<sup>①</sup>

何况阶级、阶层一经长期固定，贫困者也只能认命而已，所谓“不满”亦无法泄露，比如今日之中国，所谓“仇富”，竟被视为天字第一号的原罪，其根底大抵就在于此。

如此一来，上述“三大动力”中，便也就只剩下周边存在的夷狄，或者可以多少提醒和唤起文明社会被麻痹了的“不满之感”了。

自周代起，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，便按照方向，以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（当然，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，亦有西狄和北胡这样的说法）。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，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“不满”——即进行“自我批评”，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，现实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落后，而希望文明化。而更为重要的却是：在接触和观察中原文明、与之往来角逐之际，夷狄们亦善于分析、观察、透视中原文明的弱点，特别是发现其迷信教条、华而不实、倚强凌弱、好说不练（即今人所谓“谁打我我便骂谁”的嘴硬）等深刻缺陷——而这恰恰是“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”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，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得到的事实。

当着夷狄进入华夏、成为华夏的一部分，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，于是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、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，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，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，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，那便会兴旺发达，推陈出新；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、大傻瓜和跳梁小丑，是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那就不免要陷入“求荣取辱”、“政怠宦成”，乃至“人亡政息”的循环。

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。

<sup>①</sup> 彭慕兰，《从长时段的观点看中国发展》，《国外理论动态》，2010年第10期。

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、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、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，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。墨法学说，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、变法思想的源泉。

墨法两家，成于魏、流于楚，墨翟、孟胜、卫鞅、韩非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，四处碰壁，这主要就是因为当时“魏康楚富，齐淫吴巧”，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，文明积习太深，听不进批评意见，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，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“艰苦奋斗”（摩顶放踵，以利天下）这一条，在文明发达的地区，非但难行，而且难听（极不悦耳）；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：“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觳，使人忧，使人悲，其行难为也，……墨子虽独任，奈天下何！”

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，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“戎狄”的秦。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，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、贵族世家集团，因此，墨法“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”，“有为则上，无能则下”的平等政治主张，方才能够秦地得以实行。正因为贵族、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，正因为“不党父兄，不偏富贵，不嬖颜色”乃是秦的民风，以至“王亦不爱其家”，故“上同而下不周比”、“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”的户籍一连坐制度，亦方才能够秦地顺利推进；而更为重要的是：正因为秦开化最迟，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，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、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，故商鞅那一套以“农战”立国的思想，方唯独在秦地能够大受欢迎。

墨家子弟自魏赴楚，又去楚入秦，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，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，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、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，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，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、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——于是，开化最迟、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，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。

这便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，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。

商鞅在《商君书·农战》中，曾这样比较“境外”的秦地，与“境内”的中原文明说：

国去言，则民朴；民朴，则不淫。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，则作壹；作壹，则民不偷营；民不偷营，则多利；多利，则国强。今境内之民皆曰：“农战可避，而官爵可得也。”是故豪杰皆可变业，务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随从外权，上可以得显，下可以求官爵；要靡事商贾，为技艺，皆以避农战。具备，国之危也。民以此为教者，其国必削。

这就是说：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，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，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，正因为文明发达，方才重用巧言令色、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，而此三者具备，固可谓文明之成就，但却正是“求荣取辱”、“政怠宦成”的开端，是“人亡政息”——即国家危亡的征兆，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。

作为“戎狄”的秦，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，都六合之上游，最终统摄四海，扫荡群雄，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、务实使然，秦人正是以朴素的“又战斗来又生产”、以南泥湾开荒般的“农战”精神，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。

秦的改革蓝图，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，这种自我批评，最终演化成“西戎”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“武器的批判”。

秦王扫六合，乃是中国文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、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。

《荀子·疆国》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：

应侯（范雎）问孙卿子曰：入秦何见？

孙卿子曰：其固塞险，形势便，山林谷川秀，天才之利多，是形胜也。入境，观其风俗，其百姓朴，其声乐不流污，其服不佻，甚畏有司而顺，古之术也。及都邑官府，其百吏肃然，莫不恭俭、敦敬、忠信不桀，古之吏也。入其国，观其士大夫，出于其门，入于公门，归其家，无有私事也；不周比，不朋党，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，古之士大夫也。观其朝廷，其朝间，听决百事不留，恬然如无治者，古之朝也。故四世有胜，非幸也，数也。

文中所谓“四世”者，是指秦献公以来百年，而那正是墨法之徒入秦推行新政的时代。荀子所观察到的，恰是百年之后，中华文明在秦的甦生，这个新文明，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。

汉有天下，矫秦之枉，武帝弃“农战”而重“商战”，终使国库足而帝室富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国库，然而，不幸亦接踵而至：皇帝家产愈大、宫廷愈富，外戚、宦官的力量则愈强，如此一来，国家势必要以宫廷为中心，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藪，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混战只是表现，汉文明重新陷入“文明与腐败循环”的辩证法，不可抑止地走向“自己反对自己”的文明异化——这却是历史的必然。

汉废秦法，剖海内而立宗子，郡守之下，又实行自治。立宗国便是裂土封疆，而“地方自治”的实质，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。故终其两汉，中央“贵族”与地方“豪族”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，就在于土地分封制度，就在于“土地私有制”的恶性发展。

故柳宗元《封建论》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：“封建者，必私其土，子其人”，“非公之大也，私其力于己也，私其卫于子孙也。秦之所以革之者，其为制，公之大也。”

这就是说：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，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；相反，秦的土地国有制，则是天下之大公。

汉代以来，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，也便是土地问题。贵族、豪族圈占土地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，于是，谁掌握了失地流民，谁就能够实现霸业、掌握政权，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，便是汉末的豪族曹操。

西晋贵族，可谓将中原文明“只说不练”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，此即所谓“清谈”。因此，将西晋的灭亡，归之于所谓“五胡乱华”，这其实便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扯淡：自晋惠帝以来，司马氏王族，同胞兄弟凡二十五人，自相残杀的结果，仅剩下了三人，西晋二世而亡，不闻延祚，这就是因为文明日益发达，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，为了争夺“私有产权”，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，这便是典型的“求荣取辱”、文明异化之惨剧；而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，只不过是胡人奴

隶，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说：“大丈夫行事，当光明磊落，如日月之皎然。不应如曹操、司马懿父子，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”。

君子爱才，取之有道，坚持这一底线的是夷狄一方的“小胡”石勒，而不是华夏一方的大贵族司马氏。

“天子失政，道在四夷”这句话，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。

汉代的乱源，便是贵族和豪族，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，便是一个“官产学一体化”的强大利益集团，而其中的“产”——即大土地庄园，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，因此，救天下苍生于水火、挽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，便是实行“土地改革”。

中国历史上，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，便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，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阳，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。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，此法的核心，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地，它一方面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，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，不分贫富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，正是这项法令，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。

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，固然是贵族和豪族，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，同样是贵族和豪族，他们尔虞我诈、骄奢淫佚——自己打败了自己，而这就叫做“文明异化”的道理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，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，使唐代制度的基础，得以重新建立在“农战”——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，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，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，北国的制度显然更为平民化，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，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、健全，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，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，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。

宋代建国，始终面临着辽、金、西夏的强大压力，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精英们，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、享乐、滥情痛加反省，在宋人所作的自我批评中，以王安石、叶适为最深刻。王安石曾指出：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，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，实则比夷狄尤甚，夷狄不过迷信鬼神，而中原则迷信文词，正是这种对于文饰、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，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，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，妙手文章，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——这与其说是文明，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。

于是，他创办学校，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，以观其才德，并于校内建立操场，供学生练习骑射。又制订保甲、保马之法，叫农民学习马术武艺，先以自卫，终以服役官府，以期逐步恢复唐的“府兵”、秦的“农战”。但是，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地区，宋更是历史上商品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朝代，王安石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说：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，<sup>①</sup>使他认识到“举国奢靡，全民腐败”的现实，这样的社会，这样的文明，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，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，叹息“变成法易，变世风难”，这就是因为在“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”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，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的问题：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，而且还需再造文明。而王安石的命运，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：“其道大赅，使人忧，使人悲，其行难为也——虽独任，奈天下何！”

中原文明令人向往，但也使人堕落，正是对这种文明 / 野蛮辩证法的洞悉，正是对“文明异化”的自觉，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“南面”和“北面”两种制度，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，也不鼓励契丹人中原化，而这种措施的用意所在，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的腐败，从而消磨了英勇斗争的志气，而这里的深意，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。

明代的思想家，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，看到了对文明的迷信，于人心诱惑之甚，他们对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，尤其集中于对言辞、文饰的迷信这一点上，口诵莲花的士大夫，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、甚至没有文字的夷狄。文饰是虚伪的渊藪，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。而华夏文明的悲剧，正可概括为“只说不练”、眼高手低的悲剧。张居正《陈六事疏》，其首在“省议论”，其次在“核名实”；王阳明《传习录》：“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，圣学只一个功夫，知行不可分作两事，”——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：陷入束缚人的斗争意志、行动意志的所谓“文明”，等于堕入“温水煮青蛙”的惨境，而那正是一种天大的愚昧。

王朝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夷狄政治家，便是清圣祖康熙皇帝，他深刻地

<sup>①</sup> 王安石在此次上书前，曾任督察江南东路司法行政（提点江东刑狱）之职。宋时全国分为若干路，辖区类似现在的一个省。故文中开头即说：“臣愚不肖，蒙恩备使一路。”

指出：“打天下”固然是残酷的斗争，而“坐天下”则是更为残酷、更为艰苦、更为持久的斗争，政治作为一项空前艰苦的事业，它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。在去世之前留下的政治遗嘱中，康熙皇帝这样感慨道：

古帝王享年不永，书生每致讥评。不知天下事烦，不胜其劳虑也。人臣可仕则仕，可止则止，年老致仕而归，犹得抱子弄孙，优游自适。帝王仔户无可旁委，舜歿苍梧，禹殂会稽，不遑宁处，终鲜止息。洪范五福，终于考终命，以寿考之难得也。易遁六爻，不及君主，人君无退藏之地也。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！

康熙是伟大的政治家，更因为他懂得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，甚至就是武力，政治说穿了，便是如何正确、合法地使用武力。可惜，在他的身后不久，八旗精兵却不可遏制地退化了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武力所击溃，而这就再一次、然而却并非最后一次说明：古老而灿烂的华夏文明，她的长处是“文治”，而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，它的政治神经却不够发达。因为所谓政治，最终也就是武力，也就是专政，而文明的中国人却经常忘怀“愚蠢的夷狄”也明白的那个简单道理——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。

近代以来，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宰制中国，又是由于它所发明的资本—金融体制，正是这个发明决定了：即使列强人口稀少、万般匮乏，但唯有“钱”和资本这一条，他们从来就是“天然过剩”的，而对于华夏文明中最短视的那一部分人来说，“过好日子”乃人生唯一追求，而钱之幻象便是过好日子的唯一基础，而他们对所谓“西方文明”之向往，无非就是对于钱的向往而已。

但是，他们又总是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：所谓招商引资，无非等于给自己招来个债主，因为犹太人的钱，那从来就不是好拿的。

丢掉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那就等于把自己的生死底线抵押给了别人，使人可“不战而分吾国，定约而制中华”。

戊戌变法之际，严复在《上皇帝万言书中》曾这样感慨说：

国之富强，民之智勇，臣愚不知忌讳，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，窃以

为无一事及外洋者。而之所以获全至今者，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。故中国今日之大患，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，而阴相约，以不战而分吾国。使其约既定，虽有圣者，不能为陛下谋也。

宝爱和平，珍惜生命，享受生活，热衷消费，这是文明之花繁盛的基础；但是，这也就是武将畏死、文臣贪财、见利忘义、醉生梦死、举国腐败的渊藪，而这便是极其残酷的文明辩证法，是文明异化的残酷逻辑：

因为胜利，党内的骄傲情绪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，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，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，可能生长。因为胜利，人民感谢我们，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。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，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。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。

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，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；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，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。

而所谓“艰苦奋斗”，无非是说：“文明”绝非表面的文饰，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，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，伟大的文明，就是埋藏在行动中的朴素精神。

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，这是血的教训，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，是撬动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杠杆。

而现代科学的精神的实质，也就是批判。一人、一家、一社团、一国家，在其生存的道路上，欲求得不断之进步，那就需不断自省，就必须一面自省，一面批判，如此方才能不断地进步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上，华夏文明的进步和生存，往往是通过对照夷狄，进行不断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达到的，历史上的夷狄，便是中原文明的镜子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，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，没有夷狄，不成天下。

而近代以来，我们更有了科学这面镜子，发扬科学的精神，就是坚持批判的精神，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，首先就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日常化。

本书各篇，虽游历所记，实忧患之作也。比年疆忿日炽，海警再起，书生报国，唯有笔墨；念我列祖列宗，创业艰难，不考终寿；励我后辈子孙，行己有耻，居安思危，发愤图强。尚定学长不弃浅陋，尝以“勿悔少作”加勉，承其美意，重将原稿粗加删减，成此新编，再供读者诸君批判。

原书初版之前，仰仗李二民兄所主持之《书城》杂志逐期刊载，再版之际，又赖郑闯琦兄奔走于寒风之间，校订于继晷之时；二兄笃行朴素之志，海我尤深。

追怀先贤创业之艰辛，深感后来者之幸运，我感谢造化中存在的一切机缘，感谢所有的友人与敌人。

谨以圣王先贤之教诲，与尊敬的读者诸君相勉：

闭门求学，其学无用；若以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，则汗漫九垓，遍游四宇尚已。

河出潼关，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；风回三峡，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。

世界上一切事业及文明，固无不起于抵抗而决胜也。

韩毓海，2010年12月12日，于北京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修订版自序 .....         | 1          |
| <b>海国图志 .....</b>   | <b>1</b>   |
| 重新开眼看日本 .....       | 3          |
| 曼哈顿的秘密 .....        | 32         |
| 无穷花开鸟致院 .....       | 47         |
| <b>北国风光 .....</b>   | <b>61</b>  |
| 卢舍那 .....           | 63         |
| 自远方 .....           | 101        |
| 西北旺 .....           | 139        |
| 日出西天 .....          | 162        |
| 大雨落幽燕 .....         | 197        |
| <b>亚细亚的心脏 .....</b> | <b>221</b> |
|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.....      | 223        |
| 香巴拉的中国 .....        | 238        |
| 消逝的冰川 .....         | 260        |
| <b>风雨下江南 .....</b>  | <b>273</b> |
| 几度风雨海上花 .....       | 275        |
| 叹江南 .....           | 293        |
| 白银之死 .....          | 307        |
| 原版后记：历史的构造 .....    | 331        |

# 海国图志

重新开眼看日本

曼哈顿的秘密

无穷花开鸟致院

中国的“启蒙主义者”将 19 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崛起，归结为其所代表的“普适价值”，这是十分肤浅的。

本节所揭示的是：近代日本的崛起，深刻地植根于其源远流长的军事化社会组织结构、漫长的军国传统。而美国的霸权，则深刻地植根于其内部黑暗的金融垄断秘密、植根于金融集团对社会统治力量的攫取。

将中国和亚洲的衰落解释为文化和“国民性”的低劣，这同样是不着边际。只有当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仁人志士，通过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找到了反对“封建主义”的科学根据，才对中国的衰落作出清醒的诊断，而这便是：一盘散沙、四分五裂。

内部分裂是亚洲和中国衰落的条件，也是帝国主义宰制我们的根据。而朝鲜半岛目前的悲惨处境，不过再一次印证了这个简单的判断。